

内地城市维吾尔族农民工生活质量及改善策略 ——基于武汉地区的调查

哈尼克孜·吐拉克¹, 赛牙热·依马木²

(1.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2.新疆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 基于武汉市150位维吾尔族农民工的调查发现, 由于未能熟练掌握汉语、文化程度偏低、缺乏职业培训、固有的文化差异以及部分市民的误解等原因, 身处内地城市的维族农民工工作时间长, 劳动保障水平不高, 就业途径狭窄, 社会交往少, 缺乏归属感, 情感孤独, 生活质量不高, 难以迅速融入内地城市生活。为此, 应积极完善城市民族社会融合政策, 管理与服务并举; 提高维族农民工的文化水平, 加强专业技能培训; 增加民族间沟通与交流, 消除双方偏见, 以逐渐增强维族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发展能力, 创造内地城市居民和维族农民工之间的相互信任的、具有包容性的环境, 提升其城市生活质量。

关键词: 维吾尔族; 农民工; 城市适应; 文化接纳; 民族关系; 武汉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1)04-0045-05

Life Quality and improvement strategy of Uyghur migrant workers in the inland cities: A case study in Wuhan City

HANIKAZ · Tulak¹, SAIYARE · Yimamu²

(1.College of Soci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150 migrant workers in Wuhan,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life of Uyghur migrant workers in the inland cities is hard due to their different cultural back ground, failure to master the Chinese language, low education and lack of professional skills. It is difficult for them to assimilate into modern urban life and adapt to urban life. Hence, some measures were proposed to create an inclusive environment in mainland cities for the Uyghur migrant workers: to perfect the national policy in city and pay attention to management and service simultaneously, to give Uyghur migrant workers professional skills training, to increase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in order to remove the bias, to create mutual trust between Uyghur migrant workers and mainland cities residents.

Keywords: Uyghur; peasant workers; urban adaptation; cultural acceptance; ethnic relations; Wuhan City

流动人口能否很好融入城市社会, 事关城市社会和谐稳定大局。作为这一庞大群体中的特殊群体, 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生存、适应及融入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学者阿布都外力·依米提基于乌鲁木齐市和西安市的调查, 研究了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特点, 认为维吾尔族在语言、体质、装扮、饮食、宗教信仰、

生活习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与汉族存在较大差异, 在异域他乡适应城市生活时面临种种困难。^[1,2]《东部城市中的新疆维吾尔族务工经商流动人口研究》课题组通过对外出到东部城市售卖葡萄干的南疆维吾尔族青年农民进行问卷调查、访谈, 了解了这一群体的外出动机、组织结构、社会管理、待遇困难和发展可能。马戎通过对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劳务输出的调查, 分析了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工走向沿海城市过程中面临的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差异和困难。^[3]王汉生等通过对北京新疆村的调查, 探讨作为农民进入城市的一

收稿日期: 2011-06-1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XJC85008)

作者简介: 哈尼克孜·吐拉克(1984—), 女, 维吾尔族, 新疆喀什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种独特形式的大城市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机制以及主要影响因素。^[4]王次富、汤夺先、李伟梁的研究亦有提及。^[5-8]不难看出,上述研究的地理范围主要是西部、东部等大城市,缺少中部地区。为此,笔者拟以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中部城市——武汉为范围,分析该地区维吾尔族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并提出相应建议。

本文研究的维吾尔族农民工(以下简称维族农民工)是指具有农业户口身份的,从新疆农村劳动力中分流出来的,从事二、三产业劳动的维族劳动者。调查时间在2010年5月到7月,涉及武汉市的7个区(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洪山区、武昌区、青山区)。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观察与访谈法。总共发放170份调查问卷,最后获得有效问卷150份。

在接受调查的150名维族农民工中,从性别看,男性占87.3%,女性占12.7%,这可能是由于女性不太适合重、险、累的体力劳动,外出流动自然较少。年龄结构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平均年龄为24.6岁。未婚比例为67.7%。就其从事的职业看,在民族特色产业就业者多,在工业和建筑业就业者少。他们大多数从事的工作以饮食行业为主,技术性工作比重低。主要从事职业有:开餐厅(11.3%),餐厅服务(34.3%),卖羊肉串(48.7%),卖干果(6%)。这说明维族农民工从事的职业类型比较单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城市适应能力的有限性。

一、内地城市维族农民工生活质量考察

总的来说,在“从流入到生存、适应再到融入”的过程中,流动到内地城市的维族农民工目前只是完成了社会角色上的由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资源获取方式上的由依赖土地向不依赖土地的转变、空间位置上的由新疆农村向内地城市的转变,尚未真正实现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并完全融入内地城市社会,他们在适应城市方面面临着一些困难,生活质量不高。

1. 工作时间长、劳动保障水平不高

问卷数据显示,维族农民工中,有89.5%的调查对象一周工作7天。他们每天工作的时间为:10-12小时的占44.8%,8-10小时的占32.4%,12

小时以上的占15.2%,只有2.9%的农民工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下。是否会加班方面:68.6%的人选择有时;20%的人选择会;未填答的占10.5%;只有一个人选择不会。加班有无报酬方面:64.8%的调查对象选择“有报酬”。可见,维族农民工的工作周期和时间长,工作强度大。调查还发现,有超过半数的维吾尔族农民工认为自己的经济收入差或非常差。进一步访谈得知,他们的劳动合同签约率低,各种权利被侵犯现象时有发生,这与汉族农民工状况基本一致。由于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在城市不健全的用工制度下,一些维族农民工甘愿成为黑市劳工,劳动权益更加得不到保护。他们享有农民工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保险的比率很低。由于大、中医院的医疗收费偏高,收入不高,他们更愿意选择去收费较低的私人诊所,甚至不去看病。

2. 就业途径窄, 社会交往少

社会资本是个人依赖网络或更大的社会结构中相互调配稀缺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依赖于个人,而是依赖于个人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本包括体力、资金、劳动技能或知识。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看,除了个人的经济资本外,社会关系网络也是一个重要的和基本资本。个人具有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形成一种社会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它们在流动人口就职的城市中会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10]这具体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一方面是就业途径窄。访谈与调查显示,维族农民工流动很少通过城市用人单位经由县、乡政府在民族地区招工就业,也没有多少人通过都市电视、广告、报刊、职业介绍所获取就业信息。传统的血缘、地缘人际网络通道依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21%的人是通过老乡,34%的人是通过朋友,38%的人是通过亲戚,7%的人是通过政府找到现在的工作。这说明绝大多数维族农民工依然是靠社会关系流动,就业途径狭窄。必须指出的是,维族农民工流动主要依靠自己流动并不意味着维族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较为发达、有序。通过与被调查对象交谈发现,他们流动到武汉,之前并不知道武汉的具体情况,也没有相应的职业介绍或商业介绍机构,仅仅靠自己的努力和运气。

另一方面是与汉族人的社会交往少,沟通交流不足,即社会关系资本不足。根据科尔曼的观点,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关系中,而这种关系由资源交换达到的利益互补而形成。调查发现,维族农民工受掌握的资源量和交往范围的限制,主要的社会关系就是维族人这个群体。社会关系的拓展需要一定的时间和金钱的投入,而维族农民工在这两方面都较为贫乏。调查结果显示,维族农民工每月的收入水平大多在1000-2000元之间,主要的消费取向并不是和武汉本地市民一样去商场购物,而是“准备用着自己的需要”(31.8%),“准备寄给老家”(55.7%),“准备存钱”(12.9%)。物质资本的欠缺将维族农民工的关系网络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工余的维族农民工生活是比较单调的,他们大多选择了打牌、看影碟等低消费的方式度过。这些都促使维族农民工的交往范围局限在同质性的群体内,即使住在城市社区中的维族农民工也难以被城市居民接受。与社区居民的交往是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的最好方式,通过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以及邻居之间的交往不但可以建立人际网络,而且能得到一种认同感。但现实中的调查发现,92%的维族农民工在武汉市社会交往最多的是本民族,2.7%的是汉族,3.3%的是回族。访谈发现,尽管大多数维族农民工希望和喜欢跟汉族人交往、交友,但是他们意愿的实现往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顺利实现。大部分维族农民工在社区中的交往只限于房东、社区管理者等小范围内,就是与他们的交往也只是功能性的交往,比如收房租、有关社区管理的交涉等。

3. 城市融入度低,缺乏归属感

调查结果显示,由于语言、宗教、居住环境、文化水平、职业等差异,一些维族农民工在武汉受到过“白眼”,被视为“老土”、“小偷”、“泥巴子”,感受到部分市民不同程度的排斥。23.3%维族农民工经常受到排斥,17.3%的人偶尔受到排斥,42%的人很少受到排斥。在商店买东西的时候,31.7%的售货员对他们的态度冷漠。售货员的态度令他们感到不舒服、不自在。还有,由于极少数新疆流动人员在内地参与偷盗,抢劫,打架和闹事等,给内地居民造成不好的印象,部分汉族群众下意识地将维族农民工与维族小偷联系起来,不少宾馆、

出租车拒绝为维族人提供服务。^[11]总之,维族农民工在文化心理上游离于现代都市工业文明和传统农牧业文明之间,陷入都市不适应的境地。心理上的不适应,加上对工作的不满意,维族农民工的内心更加敏感,脆弱,致使其难以融入都市社会生活。

(1)缺乏归属感。调查显示,在武汉的工作和生活中,61.7%的维族农民工不会时刻注意自己的民族身份,但会与武汉本地人保持距离,29.3%的人时刻注意保持与其他民族的距离。在流域倾向上,87.3%的维族农民工不希望在武汉安家落户,12.7%的想安家落户。笔者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想法:“如果在武汉的工作和在新疆的工作是同样的工资,你会选择继续在武汉打工吗?”83.3%的选择回新疆打工,16.7%的表示继续留在武汉打工。这说明,大多数维族农民工仅仅将武汉当作是一个暂时挣钱的地方,过客意识比较明显。

(2)情感孤独。调查显示,64.7%维族农民工不愿意跟其他民族结婚,只35.3%农民工愿意跟其他民族结婚。他们愿意跟其他民族结婚的前提条件是对方必须信仰伊斯兰教(因为维吾尔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伊斯兰教限制穆斯林人跟非穆斯林结婚),所以愿意跟其他民族结婚时,先考虑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比如哈族、克尔克孜族、土耳其族等。不愿意跟其他民族结婚的主要原因是:7%的是认为风俗习惯不同,20%的是考虑到宗教信仰差异,13%的是顾虑到语言不通,14%的是担心饮食不习惯,24%的是缺乏亲朋支持。由于他们受到这些因素的限制,在武汉选对象的范围比其他民族的农民工较小,所以维族农民工的单身比率比其他民族农民工高。年轻的维族农民工普遍认为难于找到合适的恋爱对象,加之与亲人朋友相隔两地,造成心理失衡,情感孤独现象较为严重。

二、内地维族农民工生活质量不高的原因

1. 未能熟练掌握汉语,文化程度偏低

汉语水平和文化程度是维族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能否流动并融入(内地)城市生活的关键所在。语言方面的差异带来交流困难,造成彼此的距离和隔阂,有时因语言不同还可能造成交流双方之间的误解。据调查,维族农民工

中, 28.7%的能听懂汉语, 但不能应用汉语; 23.3%的是能听懂, 也能应用; 44%的可以熟练应用汉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想法; 4%的有汉语口语的能力但没有掌握汉语读写。尽管如此, 维族农民工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本民族语言, 这样限制并减少了和当地汉族居民接触和交流的机会。

调查结果显示, 维族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偏低, 平均受教育年限是 7.3 年,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2 年, 表明维族农民工的平均教育水平低于全国其他民族的平均教育水平。^[11]这制约了他们的就业的行业与规模。一般而言, 城市中有限的就业机会基本上是按照教育程度来配置的。维族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偏低、劳动技能低, 使其在向非农产业转移过程中面临重重障碍, 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产业, 只能在低层次产业中形成过度就业竞争。这必然成为其内地城市融入的主要障碍。

2. 缺乏职业培训

接受调查的全部维族农民工中, 没有一人接受过诸如汉语会话、劳动技能、法律法规等方面的职业技能培训。这样的调查结果或许是特殊案例, 既与维族农民工自身认识有关, 也与以往农民工培训体系缺乏统筹安排与协调有关, 如政府、用人单位、职业学校、社会办学力量各自为政, 缺乏沟通与系统安排。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城市的产业不断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化, 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要求逐渐提高。维族农民工由于适应现代化社会生产要求的职业技能低下, 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产业就业。与城市居民就业的“首属劳动力市场”相比, 他们主要集中在“次属劳动力市场”, 大多从事城市居民不愿意从事的、非管理性与知识性的职业。这一方面影响他们的收入水平, 另一方面缩小了他们的社会交往范围, 不利于其在内地城市的生存与融入。

3. 固有的文化差异

汉族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需要克服城乡差异, 而维族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还需要跨越文化差异。维族人的文化接纳更多表现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民族节日等三个方面, 其中都存在一些较为严重的融合障碍。维族农民工流动到城市, 首先遇到的就是语言问题, 这成为大多维族人在文化接纳和沟通

交流上的首要困难。此外, 维族人在宗教、生活习俗等方面的不同, 也会增加族群之间的文化隔阂, 影响移民与本地族群成员的日常交往和合作。宗教在维吾尔族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日常生活中宗教气氛比较浓, 宗教意识比较强。维吾尔族在饮食上需要清真食品, 在信仰上需要清真寺, 在葬俗上还需要专门的土葬墓地等。^[12]内地城市生活中是否能接受并且支持维族宗教文化(如宗教场所的兴建、饮食供应)及其风俗习惯, 这直接影响到维族农民工对内地城市的文化接纳程度。调查发现, 正因为维族农民工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方面与大部分汉族人的差异影响了他们与汉族的交往, 阻碍了他们在内地城市的就业与融入。

4. 部分市民存在误解

城市居民对维族农民工存在一定的误解是维族农民工难以融入内地城市的原因之一。调查发现, 部分汉族群众对维族农民工存有误解, 他们往往不愿多和维族农民工打交道, 能避免的就避免, 一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如采访中的一位汉族餐馆老板就明确表示不大愿意雇用维族员工, 他认为维族人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比较多, 有个别人还比较懒惰, 而且容易惹麻烦。一旦出现工伤或劳资纠纷等问题, 很难处理。倘若处理不好甚至会引发民族矛盾。另一些市民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和做法。例如, 很多房东不愿意把房子出租给维族农民工, 理由往往都是误认为维族人的犯罪倾向严重, 风俗习惯多, 而且卫生习惯不好等等。其实, 这些市民对维族人的印象也只是从街头巷议而来, 许多人并未真正接触过维族农民工, 只是主观性地存有疑虑。

三、改善内地城市维族农民工生活质量的策略

如上所述, 维族农民工内地生活质量不高, 源于他们缺乏必要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这导致他们无法进入正规部门就业, 只能在一些不需要劳动技能、门槛低、容易进入、工作不稳定、收入不稳定的低端附属劳动力市场从事流动性非正规就业。因此, 应采取以下主要措施加以改善:

1. 积极完善城市民族社会融合政策

关于维族农民工问题, 一些学者从城市经济发

展和社会管理角度出发,过分强调管理,相对忽视了对维族农民工的服务。事实上,目前一些内地城市对维族农民工的服务与管理较为刻板,针对他们的服务管理工作比较被动,工作观念和政策法规滞后,各职能部门、各地政府之间缺乏协调沟通,以致出现“边界管理真空”。这影响了内地城市维族农民工的社会适应的顺利进行,也说明城市民族工作面临新要求与新挑战。因此,必须结合内地城市维族农民工的社会适应困境,针对突出矛盾和民族特殊性,探索和总结促进内地城市维族工作办法,完善城市民族工作政策,帮助和引导维族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和社会融合,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来化解由于民族性带来的维族农民工身份弱势。

具体而言,应坚持管理与服务并举。一方面,由输出地政府牵头,组织较大规模的劳务输出,为维族农民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输出地政府可以与需要劳动力的企业签订劳务输出合同,并根据企业对劳务的需求来组织培训和输出。因为政府出面与企业签订合同,在劳动时间、福利保障方面都能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能有效确保维族农民工利益,避免其在工作过程中受到种种不公平待遇。另一方面,输入地政府在适度管理维族农民工的同时,应加强对他们的服务,应当通过加强法律与制度建设,充分维护维族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劳动报酬权、职业安全权、社会保障权、教育培训权、子女教育权、居住权,确保维族农民工可以自由平等地融入城市或者返回乡村,公平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平等参与民主政治,以及在精神文化方面与流入地居民融为一体。这样才能创造出内地城市和维族农民工之间以及不同民族之间一种相互信任的、具有建设性的包容性的内地城市环境,培养维族农民工对主流社会文化的归属感。

2. 加强文化教育与职业培训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早已证明,教育对人力资本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维族农民工之所以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最为关键的因素还是由于他们自身人力资本的根本匮乏。贝克尔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假设下,如果没有人力资本投资(即没有教育培训),那么,劳动力的工资将等于工人所生产产品的边际收

益。^[12]教育能够快速而且显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帮助弱势者摆脱困难,因此被视为是实现人类平等“最伟大的工具”。^[13]要想改变或提高维族农民工的地位,持续的、免费的、制度化的人力资本培训,对于迁入内地城市的维族农民工来说是一项当务之急。在维族农民工人力资本没有实质性改善与提高之前,任何对他们所提供的帮扶政策措施都只能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总之,大力提升维族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提高受教育水平,加强专业技术培训,是提高就业机会,增加收入,促进其市民化的必由之路。

调查显示,78%的维族农民工愿意接受岗前自费培训,能够承受的费用在500元之内;100%的人愿意接受政府或单位组织的免费培训,期望的培训内容集中在驾驶、电工、厨师、美容美发、家政等方面。因此,相关部门要坚持培训与就业相结合,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相结合,通过夜校、短期培训班、职业教育、专题讲座、定向和订单培训等多种形式,大力加强维族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以此提高其整体就业水平;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坚持长期培训与岗前培训相结合,在根据用工要求进行短训的同时,针对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趋势,对需求量大的工种开展储备性培训;积极发展订单培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14]这样才能逐渐增强维族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发展能力,加快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进程。

3. 增加民族间沟通与交流,消除偏见

其他族群所持有的偏见和社会实行的歧视政策,往往会强化一个族群成员的“族群意识”,拉开这个族群与其他族群之间的社会和心理距离,慢慢会变成民族问题。^[15,16]为此,当务之急是要加大民族团结教育的力度,通过多种途径,增进内地市民对维族人的认识,消除他们对维族人的误解。如可由维族农民工居住、工作的社区街道办等定期组织维族人与汉族居民的联谊活动,由社区志愿者对维族农民工进行普通话、法律等方面的培训,加强两个民族之间的交流。彼此交往增多,内地市民以往对维族农民工的道听途说的误解自然就会消除。维族农民工在与内地城市居民交往的过程中,不仅

(下转第61页)